



邨侯书院：孕育湖湘文化的沃土

王帆

南岳俊秀，风物与人文交相辉映，古代涌现过以邨侯书院为代表的众多书院，孕育了湖湘学派，光大了湖湘文化，并使之衍生勃发为中华文化中极富魅力的成分。巍巍衡山，逶迤磅礴、雄浑挺拔。抗战时期，经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议，国共两党在此携手创办南岳游干班，谱写了全民族抗战中光耀春秋的一页。邨侯书院见证了这段不朽的历史及其永恒的精神。

为追念邨侯而建存的书院

中唐重臣李泌，历仕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官至宰相，封邨县侯。李泌居官以廉废私、护忠举贤，谋国安邦、屡建勋功。任杭州刺史时引西湖水作六井，解民众居江海之地水泉咸苦之疾，现存“相国井”以示纪念。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赏他“四隐四起”“绝粒无家”。李泌早在辅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于至德二年(757年)请准隐居南岳潜心读书，长达12年，代宗时诏回。南岳山上“极高明”石刻，据传是其手迹。

邨侯书院曾经有址三处。唐元和(806—820)至长庆(821—824)年间，随州刺史李繁为追念其父李泌，在集贤峰下南岳大庙左侧建南岳书院。宋宝庆(1225—1227)年间，运使张嗣可加以改建，称为邨侯书院。元至正三年(1343年)重修，明初废于兵。嘉靖十三年(1534年)，太常少卿夏良胜来岳，同翰林院编修张治、衡山县令彭簪谟其旧址重建，以祀古今留寓南岳之名贤，改称集贤书院。1932年扩建为南岳图书馆。这是邨侯书院的一处原址。

邨侯书院另一原址在烟霞峰下谷地中，即李泌隐居之地“端居室”。该处唐、宋、明时建有兜率寺、竹林寺、衡岳寺，邨侯筑室其旁，藏书颇丰。韩愈诗谓“邨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明万历九年(1581年)，理学家王宗沐仰慕邨侯，曾在兜率寺侧筑精舍讲学。明万历二十年左右，衡宝巡按使李天植在端居室旧址筑明道山房。清乾隆年间，县令德贵于此建邨侯书院兴办义学，因地址偏僻，不久即毁，化为田土。

现在的邨侯书院，是其第三址，系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县绅陈治和集贤书院山长戴心葵等人易地移建于烟霞峰山腰。1932年重修，新中国成立以后加以修葺。书院坐北朝南，为一进五间建筑，花岗石结构，掩映在松柏环绕之中。石柱上刻着一副楹联：三万轴书卷无存，入室追思名宰相；九千丈云山不改，凭栏细认古烟霞。现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衡阳市廉政文化基地。

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邨侯书院建成以后，诸多硕彦鸿儒来南岳，创办书院传播学术，使南岳在中国书院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孕育湖湘文化的沃土。古时南岳书院夙负盛名、地位显耀。一是出现早。如果从端居



邨侯书院

室算起，邨侯书院应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间书院之一，也是南岳书院文化的典型代表。唐末南岳又创办韦宙、卢潘书院。书院之长称“山长”始自衡岳，《荆湘近事》说“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号为山长”。二是数量多。清同光年间，今南岳区内就有书院17所，旧衡山县则多达数十所。若将南岳七十二峰都算进来，稍有名气的书院不下百余所。三是影响大。坐落在南岳首峰回雁峰畔的石鼓书院、尾峰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皆属天下“四大书院”。自宋以降，南岳域内先后有文定、南轩、集贤、白沙、甘泉、东廓等著名书院。晚清的船山书院名冠湖湘。

邨侯书院不仅肇始了南岳的书院文化，并作为湖湘学派重要发源地，为湖湘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南宋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来南岳定居，最初在邨侯书院传授授徒，后筑文定书院著书立说，卒开湖湘学统。张栻早年来衡山负笈求学于胡宏，学成创南轩书院，又主讲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朱熹、张栻在南岳畅游唱酬，有声于邨侯、文定等书院，给湖湘文化留下一段佳话。明代王阳明、湛若水、邹守益等大儒都登临南岳诸书院讲学。清初王夫之在南岳续梦庵隐居著述18年，他的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促成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湖南近现代人才蔚起。

“昔贤遗迹在，流水暮烟深。”李泌淡泊功名、以社稷安危为念的浩然之气，早已融入湖湘学派血脉，同祝融播火福泽万民的厚德精神一脉相承，同心系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文化之魂相契合，同中国共产党倡导国共合办南岳游干班抗倭御侮的担当情怀相呼应。

书院原址系南岳游干班办学场地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随后，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直接建言，国共两党合作举办游干班应时而生，地点定在南岳。从1939年2月至1940

年3月，国共合办南岳游干班三期，培训了3000多名游击战干部。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带一批得力干部参与创办游干班，毛泽东豪迈地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

中共教官主要负责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游击战政治工作课程的讲授和训练，叶剑英任副教育长，李涛、边章伍、吴奚如、薛子正、李伯崇等任教员。他们真情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进步师生，苦练杀敌本领，在教学中特别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毛泽东的论述，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周恩来作为国际问题讲师，作了《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的报告。叶剑英努力采取红军军事教育办法，并亲自主讲《游击战概论》。田汉率演剧队前来宣传演出，《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在太行山上》响彻南岳上空。周恩来、叶剑英还指导南岳佛教教徒成立了救难协会，激励爱国僧道“上马杀贼”。

游干班本部设南岳圣经学校(集贤峰西侧)。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文学院曾设在这所圣经学校。一时间，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金岳霖等文化大咖云集南岳。到创办南岳游干班时，为满足师生教育训练及生活食宿的需要，圣经学校附近的南岳图书馆、岳云中学、大庙等都是办学场所，南岳山及附近地域为训练实习区。南岳图书馆恰是邨侯书院原址地。

当年周恩来为国共两党共商抗日大计及创办游干班到南岳，登祝融峰途中参观了邨侯书院，同行的郭沫若作有《登衡山邨侯书院》，诗云“犹有邨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仍令人壮志满怀、慷慨激昂！而今，南岳图书馆已改造成南岳游干班陈列馆，凛然屹立于邨侯书院旧址旧地，真切叙述游干班如何“讲我们的一篇道理”。其中饱含的同仇敌忾、众志成城的爱国家襟怀，以及“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的坚强意志，是中华文明历经劫波却生生不息的密码，更是激励海内外全体华夏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绵绵动力。

据《学习时报》

钱锺书给胡乔木改诗

胡乔木与钱锺书是清华同学，钱锺书比胡乔木高一届，但两人在学校时并不认识，直到1972年钱锺书回到北京后才与胡乔木交往，以后逐渐增多。晚年胡乔木常到钱锺书家中聊天，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亲密无间。

1982年6月1日，是胡乔木七十寿辰。生日到来前，胡乔木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写了七律《有所思》四首。诗写好后，像往常一样，送钱锺书阅改。钱锺书收到后，毫不客气，按自己的心境，大刀阔斧，改得密密麻麻，就连胡乔木最得意的一些诗句也改了。

胡乔木是一个极有礼貌的人，这就出现了“我诚

心请你改诗，你也费心改了；我期期以为不可，但又怎么好意思请你再改回去呢”的尴尬局面。胡乔木为此十分踌躇。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求助于与钱锺书关系甚密的李慎之帮他解围。

李慎之对二人是了解的。他知道胡乔木的四首《有所思》，实际上是他70岁的人生总结，是他的平生自叙。胡乔木与钱锺书虽然谊属清华校友，但是两人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投身革命，一个矢志学问。两人之间的差别，有感而发的诗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和意境。钱锺书本来十分了然，这一次似乎完全忘却了，就像改自己的诗那样，“凭着感觉走”，只顾一东二冬、平平仄仄，由兴改去。

6月12日，李慎之来到钱家充当“说客”。他与钱锺书同乡同谊，比钱小13岁，一向“倚小卖小”、直来直去，以钱锺书的绝顶聪明，不等李慎之把话说完，已经完全明白。之后，钱锺书与李慎之二人一起先恢复原文，再选择他俩共同认为不妥的地方改了几个字(如将第一首的末句“弦断琴亡志亦酬”改为“弦急琴摧志亦酬”。因“断弦”多指丧妻与作者原意不符)，这样稍做改动后由李慎之带回给胡乔木。胡乔木非常高兴。不久发表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1992年准备出版诗词集时，胡乔木采纳了钱锺书的意见，将《有所思》改为《有思》。

崔鹤同 据《人民政协报》